

明清的朝代危機與世界經濟蕭條 ——十九世紀的經驗

林 滿 紅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不少美國學者認為明朝的滅亡與當時世界性的經濟蕭條與白銀危機有關⁽¹⁾。最近有大陸學者卻指出，明清之際的白銀危機主要發生在明亡之後。明亡之前，固然有銀貴錢賤問題，但主要是因內部銅錢濫鑄導致錢賤。在銀的供給方面，明亡之前仍有所增加。當時，中國本身的銀產固然已經耗減，但在外來的銀當中，來自拉丁美洲者並非主體，日本白銀透過荷、西、葡、乃至中國自己的商人也大量供給中國所需。以致就明清朝代交替之際而言，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連並不如美國學者所說的那麼密切⁽²⁾。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再起一次白銀危機，而且較明清之際者更為嚴重。然雖見太平興亂，未見清亡。這段十九世紀的經驗是否可以更加證明明清的朝代危機與世界性的經濟蕭條根本就沒

(1)例見：Frederic Wakeman, "China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Late Imperial China*, Vol.7, No 1, June, 1986。

(2)倪來恩、夏維中，〈外國白銀與明帝國的崩潰……關於明末外國白銀的輸入及其作用的重新檢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3期，頁46—56。感謝廈門大學陳支平編輯介紹此文。

有關連？本文要指出，就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前後的這段歷史發展而言，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是一步步在促進清王朝的滅亡。但1850年以後世界經濟的空前繁榮又延緩了清王朝的滅亡。如果十七世紀世界經濟與中國的關連仍值得質疑，十九世紀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連卻是相當清楚。

本文曾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之「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感謝會中學者給予之熱烈討論。也感謝本雜誌編輯委員會提供之修改意見。

一、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白銀危機與世界經濟蕭條

鴉片戰爭前後的銀荒，長久以來被認為是鴉片進口增加造成的結果。筆者另文：「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白銀外流與世界金銀減產（1814~1850）」曾分析指出，十九世紀上半葉拉丁美洲獨立運動所引發的世界性金銀減產與經濟蕭條，是鴉片進口增加背後、也是鴉片進口增加以外促成中國白銀外流的更根本因素⁽³⁾。

1493至1900年間的世界銀產量變化如表一所示。在1810年到1850年間，世界的銀產量一度滑落。一直到1856年以後才恢復到1801~1810年的生產水平。1811年到1840年間世界白銀的減產幅度最大，約僅1801年至1810年間之一半左右。金在1820年代、1830年代之間也有顯著的減產現象。這次金銀減產基本上是世界主要金銀產地拉丁美洲發生獨立運動，使金銀的生

(3)此文發表於今年5月18—19日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舉辦的第四屆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之中。該所並將編出會議論文集，此處為免重覆及精簡篇幅，僅摘述其要點。

表一 世界銀產量(1493~1900) 單位：百萬盎司

年	代	銀產量	年	代	銀產量	年代	銀產量
1493—1520		1.5	1821—1830		14.8	1885	92
1521—1544		2.9	1831—1840		19.2	1886	93
1545—1560		10	1841—1850		25	1887	96
1561—1580		9.6	1851—1855		28	1888	109
1581—1600		13.5	1856—1860		29	1889	120
1601—1620		13.6	1861—1865		35	1890	126
1621—1640		12.7	1866—1870		43	1891	137
1641—1660		11.8	1871—1875		63	1892	153
1661—1680		10.8	1876		68	1893	165
1681—1700		11	1877		63	1894	164
1701—1720		11.4	1878		73	1895	167
1721—1740		13.9	1879		74	1896	157
1741—1760		17.1	1880		75	1897	160
1761—1780		21	1881		79	1898	169
1781—1800		28.3	1882		86	1899	168
1801—1810		28.7	1883		89	1900	174
1811—1820		17.4	1884		82		

資料來源：Pierre Vilar, *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 1450—1920*, Judith White trans. (London, 1984), p.351。

產受到破壞使然。在世界貨幣仍以金銀為本位的時期，此次銀與金的減產，直接造成貨幣供給增加率的下跌，加上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盛行，傳統勞工為新技術工人所取代而產生失業現象等種種因素，遂造成了世界性的經濟蕭條⁽⁴⁾。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約有百分之九十的財政收支，約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一般交易值，是以銀計。而當時中國所使用的銀，一半以上來自拉丁美洲⁽⁵⁾。如此大量的美洲白銀，係以中國絲茶出口歐美換來。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世界經濟蕭條削弱了歐美購買中國絲茶的能力。在百業蕭條的情況之下，很多商人轉而從事高利潤的鴉片貿易，重要鴉片煙商怡和洋行即為其中一例。絲茶滯銷減緩了白銀流入中國的增加速度。

而鴉片的增加進口，更加速了白銀的流出中國。設若只有鴉片進口而沒有世界性經濟蕭條致使中國絲茶出口滯銷而有大量白銀進口以抵銷鴉片進口流出的白銀，中國仍會有白銀流入。由此可知，世界金銀減產所引發的世界性經濟蕭條（它一方面促使中國絲茶出口滯銷，另一方面更加速鴉片進口），才是此時中國白銀外流的根本因素。

(4) 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周期性工業危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第三章；Pierre Vilar, *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 1450—1920*, Judith White Haus (London, 1984), p.320。

(5) 此部分敘述所涉及之統計細節，詳見：林滿紅，〈世界經濟與近代中國農業——清人汪輝祖一段乾隆糧價記述之解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台北，民國78年2月，頁302—306。及Lin, Man-houng "Currency and Society: The Monetary Crisis and Political-economic Ideology of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1808—1854,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89, Ch.6 & Ch.7。

在 1814 年至 1850 年期間，中國約流失了一億五千萬墨元的白銀。這些白銀佔當時中國以銀與銅錢合計的貨幣總值約 11%⁽⁶⁾。此外，銀供給的減少還導致中國當時另一低值貨幣——銅錢供給減少其增率。

以往學者多半認為在鴉片戰爭前後白銀外流之際，由於清政府的腐敗，使原來規定只能由清政府發行的銅錢在發行方面失去了控制。或是官方的鑄錢局，或是民間的私鑄，都提供了大量的劣質銅錢。一方面因為銅錢本身的價值因此降低，另一方面因為銀供給的減少而導致銀本身價值提高，終於導致有清一朝空前的銀貴錢賤現象。

此時是有相當多的劣質銅錢。但是，目前留下的銀錢比價記錄多半是官方的比價，仍是銀與較好的銅錢之間的比價。但即使是品質精良的銅錢，對銀而言，也是越來越貶值。加之，品質不好的銅錢在流通市面一段期間後，其與銀之間的比價往往較品質好的銅錢為低，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不持久。因此銅錢濫製本身不足以構成銀貴錢賤的重要理由。而且，就銅錢的總供給數量的增加速度而言，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一個直接的證據是此時以銅錢表示的物價下跌。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之下，一般來講，物品的供應的增加速度會減少，而當時更少的銅錢來購買物品，那表示銅錢增加速度比物品慢得許多。

1820 年代是這次白銀危機的轉捩點。此時世界金銀供給進入低谷，鴉片進口量由一年一萬擔增加為一年三、四萬擔，中國的貿易收支即使是不計算走私出口的白銀部分也開始出現赤字。

(6)此部分計算詳見 Lin, Man - hong, op. cit., pp.210 - 219。

而就在 1820 年代，清朝政府的中央與地方往來文件中出現了大量採銅困難、銅錢鑄造成本高於其以銀計算的市價、軍人百姓不願接受銅錢等的呼聲。官鑄錢局因而一一減鑄或關閉。即使文獻上仍不斷看到有私鑄的情形。但如果比起嘉慶時期，私鑄銅錢的數量相對是減少了。

之所以在 1820 年之後，採銅、鑄錢方面的困難越多，進而連私鑄都有減少的趨勢，最主要是因為採銅、製銅本身都需用銀。銀既然日趨昂貴，採銅以及製造銅錢的成本也就越高。而在銀貴的普遍趨勢之下，銅錢也相對的越來越不值錢。在成本越來越高，成品又越來越不值錢的情況之下，銅錢的減鑄乃是必然的結果。在這時期，除了官鑄及私鑄銅錢之外也有錢莊發行的錢票會增加以銅錢為面值的貨幣數量。但因錢票大多數是可以兌現的。在銅錢供給減少的情況之下，因錢票發行而增加的以銅錢為面值的貨幣也就極為有限。整個銅錢總供給的增加幅度也就比十八世紀末期為小⁽⁷⁾。

雖然銅錢供給的增加趨勢普遍減緩，但因銀減少的幅度較大，而且越來越大，銀貴錢賤的情勢還是越來越惡化。有清一朝的銀錢比價在康、雍、乾三朝的一百多年當中，大抵維持在一兩換七百至九百文銅錢之間。乾隆末期、嘉慶初期的 1775 年至 1801 年之間略為上揚至一兩折一千文左右。1802 年至 1807 年之間又降至九百多文。1808 年至 1854 年間則由一兩 1040 文漲至 2270 文。在這以後，直至清亡，大抵維持在 1500 文上下。

1808 年至 1854 年間空前的銀貴錢賤現象與貨幣供給增加率

(7)有關鴉片戰爭前後銅錢供給問題的討論詳見：Lin, Man - houn g op. cit., ch.5。

減少，也就是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白銀危機的兩大層面。這個危機係以世界性的經濟蕭條為最根本的背景。以下將討論世界經濟蕭條如何透過這兩個層面的銀元危機幾乎顛覆了大清王朝。

二、世界經濟蕭條與清王朝的危機

在白銀危機的兩個層面當中，貨幣供給增加率減少的最直接影響是百業蕭條、失業增加。銀貴錢賤則造成政府與百姓之間、地主與佃農之間、批發商與零售商之間、僱主與零工之間關係的緊張。失業增加與社會關係的緊張都助長了社會衝突。相對應地，貨幣短缺下的百業蕭條以及銀貴錢賤兩者都減少了政府的稅收。由於政府開支以銀為主，銀貴也導致政府的支出增加。百業蕭條與銀貴錢賤也減少了官吏與軍人的收入，政府部門的這些變化也使其難以應付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

(一) 社會衝突的繼長增高

1. 蕭條與失業的發展

貨幣短缺的結果，很直接的影響是商業的不景氣。馮桂芬指出，由於銀的危機，「富商大賈，倒罷一空。凡百貿易，十減五、六」⁽⁸⁾。若干奏摺指出，因為資金的短缺，1835年前後廈門到東南亞的帆船貿易減少了約40%。另一奏摺也提到福建、廣東、天津帆船貿易在此期間急劇衰退⁽⁹⁾。由於經濟作物的市場受

(8)馮桂芬，《顯志堂稿》，11：32。

(9) Wang Yeh - chien,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 1644 - 1850," in Hou Chi - ming and Yu Tzong - shian, ed.,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1979), p.445。

到商業蕭條的影響，農業也有所萎縮，並導致田價下跌⁽¹⁰⁾。農商兩業蕭條，失業的流民因而增加。除了零星有關此時期失業增加的記載之外，1850 年左右安徽巡撫王直（直隸清苑人）的一段記述更清楚指出此時期失業人口的增加：

然今日所患，則莫甚於游食者多。臣青壯年時，聞父老所傳，謂往時一鄉一集，其游惰無業者，率不過數人，衆皆非笑，無所容身。今則數百家之聚，數十人不等，習以爲長。鄉里如此，城邑可知。此語已逾二十年，今當更甚⁽¹¹⁾。

游民人數在每個市集當中，由數人轉爲數十人再轉爲更多。民窮失業的結果，往往是「去爲盜賊」⁽¹²⁾，而增加社會的緊張。

2. 銀貴錢賤與社會緊張的提升

雖然清政府於乾隆九年（1744 年）曾規定百姓以銀納稅，但除了北方若干省份之外，各地多半仍以銅錢繳納縣官，縣官再至公私銀號折換成銀兩上繳中央⁽¹³⁾。由於百姓納稅以銀計，大多數的百姓收入又以銅錢計算。銀貴錢賤的結果，百姓所售農產品以銅

(10) 太平山人，〈道光朝的銀荒問題〉，《中和月刊》，1：8，41—55（1940 年 8 月），頁 46。

(11) 彭澤益，〈十九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清廷財政危機和財政搜括之加劇〉，《歷史學》，頁 41。

(12) 馮桂芬，《顯志堂稿》，11：32。

(13) 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58：60；繆梓，《繆武烈公遺集》，1：10b，16a—b；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上冊，頁 32、42、102、109—110；《宮中檔》，道光 26.9.9 山西巡撫摺，道光 27.6.26 廣西巡撫摺；《上諭檔》，道光 9.12.16。

錢計算的價格又有下跌趨勢，百姓在出售其產品以納稅的過程中，蒙受了兩層的損失。馮桂芬即指出此一現象：國家之所取，乃在至少至貴之銀。置其所有，徵其所無。粟逾益賤，銀逾益貴。始以粟易錢，則粟賤而錢貴。向之每擔入三千文者，今入一千數百文。是十折而爲五六。繼以錢易銀，則錢賤而銀貴。向之每兩出一千餘文者，今出二千文。是又十折而爲五六。以銀準粟，昔之一兩，今之三兩也⁽¹⁴⁾。

繆梓也指出因爲銅錢對銀貶值，米對銅錢貶值，造成百姓負擔由道光初年至道光三十年左右增爲兩倍，而道光三十年的稅負又爲乾隆嘉慶時之三倍：

道光初年，每銀一兩，亦止值錢千一二百文。近年銀價，每一兩至易錢二千一二百文及三四百文不等。糧戶完正銀一兩，加以隨正耗銀，每銀一兩需錢二千三四百文。是較之道光初年，常以兩年之糧，完一年之糧。較之乾隆、嘉慶以前，更以三年之糧完一年之糧。加以生口日繁，穀價滋賤，糶穀輸租，已嗟鉅罄，其爲民患如此⁽¹⁵⁾。

在繳稅的過程當中，如果百姓以銀繳納，必是單位較小的銀兩或銀元。縣官仍需拿到銀號重新熔鑄成較大的稅銀。在銅錢折換銀兩，以小單位銀元、銀兩熔鑄成大單位銀兩的過程當中常常會有耗損。在呈繳稅銀的過程中，也需支付運輸成本。這部分耗損與運輸成本，往往以增加納稅時銀錢兌換比率來彌補⁽¹⁶⁾。

(14)馮桂芬，《顯志堂稿》，11：32。包世臣，《安吳四種》，26：15亦有類似觀察。

(15)繆梓，《繆武烈公遺集》，1：15b。

(16)繆梓，《繆武烈公遺集》，1：29a，指出以上支出常使稅計時的銀錢折換率較市價浮算了三分之一。

在銀價不貴的時期，如市面上的銀錢比價為 700，而政府以 1000 折算，則夠支付這些繳納過程中的額外開銷，有時甚而還有剩餘。因此納稅不會遲延。在銀貴錢賤之後，人民因為銀貴錢賤已經損失很多，加上這部分額外開銷要由浮算銀錢比價（比市價還高）來支付，百姓更難接受。有些地方的百姓肯接受 50% 至 60% 的浮算，有些地方只肯接受 30% 至 40% 的浮算⁽¹⁷⁾，政府與百姓之間常因此而爭執不休。

為了避免百姓騷亂，有些官吏不強迫百姓繳納應繳的稅額，則將會短收稅入。短收程度可高達 30% 至 40%。固然可能有別項名目動用稅款，但造成這個短收的原因主要仍是銀貴。繆梓即曾指出此一事實：「以民間十分之賦，完司中六七分之額。以致清查案內，虧缺鉅萬。雖其間有別項挪移之款，而銀價之不敷，實居其五六。」⁽¹⁸⁾包世臣以其親身經驗指出，當他 1839 年擔任江西知縣時，就每一兩的稅，他得賠 80 文⁽¹⁹⁾。

有些縣官賠不勝賠，只好要求百姓照額納稅，民變的發生也就難免。當時的御史朱嶠即指出，「如前此南北之耒陽、崇陽，及近日福建之台灣，浙江之奉化，百姓滋事，皆因州縣徵收錢糧加重所致，而州縣之議加重，又實因銀價過昂，官賠無著所致。」⁽²⁰⁾由於承擔納稅責任的是地主，在稅收負擔提高的情況下，必增加佃農的田租負擔，連帶地也促發抗租的活動。江蘇昭文縣佃戶張榮榮等「約會衆佃挾制各業戶減價收租」，因「未見各業戶

(17) 《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上册，頁 31。

(18) 繆梓，《繆武烈公遺集》，1：16b。

(19) 包世臣，《安吳四種》，26：15b。

(20) 朱嶠，〈運錢法以握利權疏〉，《皇朝道咸同光奏議》，38：3—4。

知會減租」，而搗毀業戶 36 家即為一例⁽²¹⁾。這些抗糧抗租事件就清實錄所登錄的即有十起。以崇陽事件為例，且是「聚眾二萬人」之大規模抗議⁽²²⁾。這種衝突也發生於傳統的工商業界。作坊的工人向老闆要求增加工價的事件此起彼落⁽²³⁾。而手工業者係以銀兩買進大宗的生產材料，其產品則以貶值了的制錢出售。是以「凡布帛菽粟佣工技藝以錢市易者，無不受其虧損」⁽²⁴⁾。

失業率的增加，社會摩擦越來越嚴重的結果，根據統計，1842 年至 1849 年間一共有 110 個騷動或民變發生⁽²⁵⁾。這些社會衝突發生在江蘇、浙江、福建的，與會黨並無關連。發生於 1847 年以後的廣西、廣東、湖南的，則與會黨有關。當與會黨有關的抗爭往東發展時，東南原有的抗爭提供了會黨抗爭的群眾基礎。原來自發性的經濟抗爭也就與反清的會黨抗爭結合起來，而醞釀出空前激烈的太平天國之役⁽²⁶⁾。

(二) 清王朝的危機

在社會衝突激烈的情況下，清王朝一面因白銀危機而財政窘困，而其官吏、軍人亦因銀元危機收入短少而士氣低落。銀元危機及清政府所訴諸的賣官鬻爵辦法也在在瓦解了清王朝原來所植基的價值體系。

(21) 陳在正，〈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國內階級矛盾的激化與太平天國革命〉，《廈門大學學報》，1980，第一期，頁 10。

(22) 同上，頁 7—12、15。

(23) 彭澤益，前引文，頁 58。

(24) 吳嘉賓，〈錢鈔議〉，《求自得之室文鈔》，4：15；彭澤益，前引文，頁 57—58。

(25) 侯厚吉，《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一冊，頁 237。

(26) 陳在正，前引文，頁 16—19。

1. 清政府財政的窘困

由於銀貴錢賤造成農民繳納賦稅的困難，田賦短收約 10% 至 30%⁽²⁷⁾。鹽稅的繳納也受銀貴錢賤影響。由於鹽商售鹽係以銅錢計算，買進鹽以及繳納鹽稅，又以銀計算。鹽價提高又有鹽梟競爭，以致鹽商售鹽價格低，而買鹽、納稅負擔重。鹽的售價也因此常不及成本之半，負責催繳納稅的頭人經常賠累，每位鹽商都試圖擺脫鹽的承銷執照⁽²⁸⁾。鹽稅因而短收約 33%⁽²⁹⁾。關稅部分，因為貿易蕭條，根據馮桂芬所說，也是減少⁽³⁰⁾。除了以上幾項主要的正稅之外，非正式的政府收入也不如從前。即使此時捐納辦法更普遍的被採用，但捐納的錢數也遠遠不及乾嘉年間。馮桂芬指出這項事實及理由：

乾嘉間一例之開，動贏千萬，數商之助，動贏百萬。今則開捐助餉，應者寥寥，此何故也？中國之銀止有此數。不過相流轉於上下之間，開捐助餉，無非挹彼注茲之法。今則無可挹，何有注？雖劉晏復生，不能轉無為有矣⁽³¹⁾。

一如捐納，整個財政稅收的短少，也都是全國銀供給短缺的函數

(27) 王慶雲，《石渠餘記》1980，3：37a—39a；劉克祥，〈十九世紀五十至九十年代清政府的減稅和清賦運動〉對這個發展有很精闢的分析，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第七集，頁295—308。

(28) 《道咸同光四朝奏議》，商務1970年版，頁921，道光30年山西巡撫兆那蘇圖奏摺，《籌辦夷務始末》2：4—6，道光18年黃爵滋奏摺；*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 1847, Vol. XL, p.142。

(29) 《石渠餘記》，5：32b—37a。

(30) 馮桂芬，《顯志堂稿》，11：32a。

(31) 馮桂芬，《顯志堂稿》，11：32b。

。如果不計算非正式的稅收，1841、1842、1845、1849等年的稅收，每年平均短少了14.28⁽³²⁾。1848年一位御史則指出稅收短少的總額達總稅收的三分之一⁽³³⁾。在整個稅收短少的過程中，中央政府所受影響最大。因為據王慶雲指出：在課稅困難而蠲免稅收的過程中，多半是減免起運中央的那一部分稅收⁽³⁴⁾。戶部所存的稅款餘額如果以1842年為100，1843、1845、1848、1849、1850年的指數分別為73、83、81、80、66⁽³⁵⁾。正如包世臣所說：「蓋銀價之於錢漕，如米之與飯。」⁽³⁶⁾銀元危機的確是此時清政府稅收短少之根本因素。

在政府收入因銀貴而短少的同時，政府的支出則因銀貴而增加。因為政府的支出多半是以銀計算，隨著銀價的增漲，政府的花費也有所增加。以漕運過程中給運丁的津貼來說，「有銀款，有洋款，有錢款。銀洋款十之八，錢款十之二。按款津給，牢不可破。洋價依銀價上下，以一縣給幫費銀三萬兩核計，較之道光初年便加貼錢三萬餘串，不待幫費議增，而州縣已倍出。」⁽³⁷⁾在收入短少，支出更形昂貴的情況下，很多政府該做的事，如灌溉、救災、地方自衛等都告廢弛，社會動亂也因而更為頻仍，政府為了平亂，得開銷更多經費，財政也因而更為窘困。馮桂芬很具

(32)根據王慶雲，《石渠餘記》，3：49b—50a算出。

(33)《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頁842。

(34)王慶雲，《石渠餘記》，2：41。

(35)彭澤益，前引文，頁49，引鈔檔資料。

(36)包世臣，《安吳四種》，26：39a。

(37)繆梓，《繆武烈公遺集》，1：18a，漕運負擔因銀貴而倍增事亦詳見前引劉克祥文，頁297。

體的指出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

錢賤而銀貴，……國家之出銀也。常以三兩而供一兩之用。……而撙節之說起。撙節甚，而因循之事成。應修之水利不修，因之宣蓄無資，農田易成旱潦，轉以蠲卹損帑金。應設之巡緝不設，因之養癰貽患，穿窬變為跳梁，轉以徵調糜軍餉。凡地方應辦之事，大多以工用支絀，概緩籌議。卒之，事後補救，需費更多。歧中有歧，弊益滋弊。如是而國安得不貧，揆厥原本，無非銀貴有以致之⁽³⁸⁾。

收入越來越少，支出越來越多，政府的財政赤字到1843年至1849年之間已達正常稅收之12%⁽³⁹⁾。

2. 軍人、官吏的收入減少以及官僚系統的腐化

一個王朝除了掌握稅收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官吏與軍人為之效命。在銀荒期間，官吏與軍人的收入都曾受到影響。

軍人的薪餉，就面額來講，並沒有改變。但是軍人的薪水當中，有一大部分是用官方鑄錢局所鑄的銅錢支付。依照道光十年江南道監察御史徐培深指出：「查定例，……京師設寶泉、寶源二局，外省亦設局照例鼓鑄，搭放兵餉。」⁽⁴⁰⁾即使在銀貴錢賤的時期，在搭放兵餉時，仍以1：1000來折算名目上以銀兩計算的兵餉，如馬兵每個月2兩，步兵每個月1.5兩⁽⁴¹⁾。根據御史張修育指出，以1：1000折算原來立法的本意，是為了對士兵有利

(38) 馮桂芬，《顯志堂稿》，11：32a—b。

(39) 彭澤益，前引文，頁49。

(40) 《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上冊，頁89。

(41) 王慶雲，《石渠餘記》，1890，2：42a。

：「錢法定例之初，紋銀一兩，在時價只合制錢七八百文，是以例價折錢一千，原為優待兵丁起見，今則時價高於例價。」⁽⁴²⁾也因為這樣一個原來是對士兵有利的規定，在銀貴錢賤時期轉為不利，有關士兵因此規定而更為貧困的陳情，就目前已看到的奏摺，其年代、省份的分佈為：1822，山西；1824，福建；1829，直隸；1831，陝西；1833，湖南；1835，江蘇；1836，陝西；1840，新疆；1841，山西；1842，福建；1842，廣東；1842，陝西；⁽⁴³⁾可以說遍及全國，而且也由1820年代持續到1840年代。官吏的本薪也並沒有減少，而且是以銀支付⁽⁴⁴⁾。但地方官常需賠補短收的稅額。此外，官吏多半還兼為地主或私下從事一些商業投資⁽⁴⁵⁾，在農商兩業普遍蕭條的情況下，官吏的這方面的收入必然受到影響。

龔自珍的「明良論」曾描述這個時期官吏因為生活拮据而無心政事、學術的情況：

今上都通顯之聚，未嘗道政事談文藝也；外吏之宴游，未嘗各陳設施談利弊也；其言曰：地之腴瘠若何？家具之贏

(42) 《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上冊，頁151。

(43)(1) 《實錄》65：36，道光4.2.27，福建；(2) 《上諭檔》，道光2.9.13，山西；道光9.12.16；直隸，道光11.8.7；陝西，道光13.3.20，湖南；道光15.8.23，江蘇；道光16.7.6，陝西；道光23.10.17，湖北；(3) 《宮中檔》，道光21.11.24，山西；道光22.2.27，福建；道光22.3.14，陝西；道光22.4.22，貴州；道光27.6.26，廣西；道光21.11.29，江西；道光22.1.22，江蘇；道光23.4.12，陝西；(4) 《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上冊，頁78—79，道光24，直隸；頁88，道光20，新疆。

(44) 繆梓，《繆武烈公遺集》，1：18a。

(45) Chang, Chung - Li, *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 Washington Press, 1962), pp.125 - 195。

不足若何？車馬敝而責券至，朋然以爲憂。……謂外吏富乎？積逋者又十且八九也。……內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軀保室家，不復有所作爲，……豈其無心，或者貧累之也⁽⁴⁶⁾。

這些官吏在貧困的情況之下，不但無心政事，更進而腐化了政治。曾經在北京居住六年的沈垚說：「都下無一事不以利成者。」⁽⁴⁷⁾馮桂芬指出：「大小京官，莫不仰給於外官之別敬、災敬、冰敬，其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既然要如此效敬京官，則「外官自督撫以至典史，某闕肥歲贏若干，某闕瘠歲賠若干。所謂肥瘠者，皆陋規之屬，揚揚然習於人口，不以為怪。」⁽⁴⁸⁾

在官吏本身無暇管理政事的情況下，很多事務都交給幕僚胥吏去做，更惡化了整個官僚體系的貪污之風。甚而有縣令、知府要拜布政使衙門中掌權幾十年的幕友爲「耆老」，因爲他掌有推薦縣令、知府的權力。這位幕友的子孫、姪兒女、親友所開的紹興酒店、錢莊、貨店，都是賄賂的門徑⁽⁴⁹⁾。根據一位御史的估計，一年中胥吏幕友所吞食的公款約有全國稅收的五分之一⁽⁵⁰⁾。

固然，每個時代都有貪污，但同樣的一位御史指出，幕府的

(46)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第一冊，頁30。

(47) 沈垚，《落帆樓文集》，10：4a。

(48)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1885，上卷，〈厚養廉議〉，7a。文中引林則徐有關此以利潤討論官職之事的反應，林則徐卒於1850年，故馮桂芬所說的這一現象，本文仍以爲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現象。

(49) 《上諭檔》，道光16、5、18。

(50) 《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頁1159。

索價由嘉慶朝之爲 100 至 200 兩漲爲道光年間之爲小縣 500 至 600 兩，大縣 1000 至 2000 兩。沈垚也指出，「昔（乾隆嘉慶年間）之公卿，雖兼取富人，而所任用，究在有才學之人。故于事尚無所害。今（沈垚生於 1798，卒於 1840）之公卿，所任用者專在多獻寶之人，則于天下事，不知胡所底止矣。」⁽⁵¹⁾可見道光年間，貪污的情況遠比乾隆、嘉慶年間嚴重。

以金錢腐化政治的情況因爲清廷大開捐例而更制度化。到了 1852 年，朝廷爲籌救平太平天國的軍餉大開捐例，已使清廷用以籠絡人心的科舉考試制度失去作用。都察院左都御史花沙納即指出：「富豪競進，寒士向隅，爲乾隆時所未有。然天下士尚踴躍觀光者，以科甲一途，非銀錢所能爲力，猶足貴耳。今乃並此而捐之，胥天下而出於利途，益令垂首喪氣口議腹誹，是失士心也。」⁽⁵²⁾

導致清廷如此正式賣官鬻爵的太平天國之亂又進一步耗竭了清王朝的庫存。到了 1853 年，清廷只剩二十九萬兩庫存，這些銀兩已不足以支付旗兵的兵餉及官吏的薪水⁽⁵³⁾。因爲一般而言，官吏、軍人薪水年需約三千萬兩⁽⁵⁴⁾。清王朝不但無法維繫一個健全的官僚或軍事體制，事實上，整個王朝的官僚、軍事體制皆瀕於瓦解。

(51) 沈垚，《落帆樓文集》，卷 10，頁 206。

(52) 《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頁 1067。

(53) 彭澤益，前引文 2：131—151（1979.6），頁 1，引自《戶部鈔檔》。

(54) 繆梓，《繆武烈公遺集》，1：18a。

三、清王朝的中興

在 1853 年清王朝已經頻臨滅亡之際，又陸續發生了捻、苗、回之亂。根據彭澤益統計，1850 至 1870 年間的內亂使清政府共花用了四億二千兩銀子。⁽⁵⁵⁾而清王朝不但沒有覆亡，反而在平定這些叛亂的同時，締造了所謂的「同治中興」。清王朝何以突然增加許多平亂的經費並延續到 1911 年？

1853 年起始有釐金稅收。幾乎同年，海關稅收轉由外人掌管，1858 年起並將此事納入條約章程，此後關稅成為清廷非常穩定的一種稅源。1858 年之後，洋藥（進口鴉片）稅開始徵課，土藥（土產鴉片）稅在地方上也陸續成為稅源，其他原有的商業稅如鹽稅、雜稅、常關稅等也在增加之中。這些商業稅收到 1890 年時佔總稅收之比例為 65%。田賦相對地只佔總稅收 28.2%⁽⁵⁶⁾。在 1841 至 1849 年間，商業稅佔總稅收的比例只為 11%⁽⁵⁷⁾。田賦在 1850 年以前佔清朝稅收的比例一直在 75% 左右。1850 年以後，田賦收入有時可能減少，但大抵未減少很多，何以商業稅佔總稅收比例會增加如此之多？

在太平天國之亂期間，很多官吏已不斷指出農業稅收沒有增課的餘地，只有商業稅收可以增課。如程鴻詔指出：「農之利少而有定，商之利博而無定也。利博而無定，則征之非過也。」⁽⁵⁸⁾

(55)同上。

(56)林滿紅，〈晚清的鴉片稅，1858—1906〉，《思與言》，16：5：28。

(57)Jerome Chen, *Stat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Ch'ing Government, 1840 - 1895*, (New York: Garland, 1950), Table XXI。

(58)侯厚吉，《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頁 309。

如果就十九世紀上半葉銀荒的時期看來，商業也是蕭條，何以到1853年以後，商業轉而有很大的發展而經得起如此大幅的稅收增課呢？

以往史家往往以為鴉片戰爭前後的白銀外流現象持續到整個清朝末期。而事實上，在1814至1850年的37年間中國流出約一億五千萬墨西哥銀元的白銀之後，在1850至1866年的37年間，有七億二千五百萬元的銀元流入中國⁽⁵⁹⁾。與1814至1850年間的白銀外流造成中國境內的商業蕭條相對應地，1850至1886年間流入中國的白銀對商業發展必然有推進的作用⁽⁶⁰⁾。問題是何以1850年至1887年間有相當於1814至1850年間外流白銀五倍的白銀流入？實際上，1850年至1887年間鴉片進口，無論值與量，都在1850年以前的兩倍以上。之所以有白銀回流，是世界經濟的空前景氣造成中國茶、絲大量出口。這二項出口不但可以抵補鴉片進口用掉的白銀，還可以賺取更多的白銀。而世界經濟之所以由十九世紀上半葉之蕭條轉而為景氣，植基於世界金銀產量之大量增加，自由貿易政策盛行及鐵路、航運等的交通改進⁽⁶¹⁾

(59)林滿紅，《世界經濟與近代中國農業》，表七。王宏斌，《晚清貨幣比價研究》，雖然接受1866至1874年間有白銀流入中國，但不接受1855至1865年間中國有貿易順差。關於這一點，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上册，人民出版社，1989，頁359—364引用更多資料指出，至少從1853年起，中國國際收支從入超轉變為出超是確定無疑的，本文仍從嚴說。

(60)王宏斌，《晚清貨幣比價研究》，頁86—91，很有貢獻地指出太平天國等內亂對國內商業的破壞。但同書頁67也說：「毫無疑問，太平天國時期中國貨的出口確實有很大發展。……同一時期，鴉片走私貿易更加猖獗。……」不管是出口的增加還是鴉片進口的增加，都是商貿發展的現象，也是鴉片稅、關稅、釐金等等的稅基。

。世界銀產於 1851 至 55 年間恢復到 1801 至 1810 年間的水平之後，一直增加到 1887 年，已為 1851 至 55 年間之三倍強（見表一）

。世界金產量，由 1811 至 1881 年更增為十四倍以上⁽⁶²⁾。這是因為十九世紀上半葉的金銀減產刺激了美國加州、澳洲及其他原有金銀產地之增產。

由十九世紀的經驗，可以看出清王朝的命運因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世界經濟蕭條幾乎滅亡，也因十九世紀 50 至 80 年代世界經濟的空前景氣而告中興。

如果與明朝比較，在明亡以前，由西班牙進口的銀元約僅兩千六百萬元。而由日本進口的白銀，則約有七千萬銀元。入清以後，1648 至 1697 年間，仍由日本進口了約二千五百萬銀元。1709 至 1764 年間則只進口九萬五千元的日本白銀，1763 至 1840 年間反而由中國出口九十五萬元的白銀到日本。反之，1700 至 1751 年間中國由拉丁美洲直間接進口的銀元約六千八百萬元，1752 至 1800 年間則約進口了一億元。⁽⁶³⁾魏源曾指出：「銀之出開採者十之三、四，而來自番舶者十分六、七」⁽⁶⁴⁾。佔中國所使用白銀 60 至 70% 的番銀，也正是直間接來自拉丁美洲的銀元。這與明亡以前，西班牙進口到中國的銀元為日本進口到中國的銀元的三分之一以下在比例上已經有很大的轉變。

(61)詳見林滿紅，〈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白銀外流與世界金銀減產（1814—1850）〉，杜岡·

巴拉諾夫斯基，《周期性工業危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第三、四、五章。

(62) Vilar, p.331。

(63)詳細計算見林滿紅，《世界經濟與近代中國農業》，頁 303，304。

(64)魏源，《聖武記》，14：33。

中國在十八世紀以後對拉丁美洲銀元的倚重日深，相對的日本因為本身銀產仍敷本國所需，並無需由西班牙進口白銀。就物價發展的趨勢而言，十八世紀中國與英國（世界經濟重心）的物價同時顯著上漲時，日本物價仍極平穩，甚而下跌，十九世紀上半葉，中英物價下跌之時，日本物價反而呈上漲趨勢⁽⁶⁵⁾。中國與世界經濟在十八世紀下半葉以後的密切關連由這個比較也可以看得更為清楚。

歷來對清王朝衰微的解釋，一方面是由王朝本身的腐敗著眼。另一方面則強調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就十九世紀上半葉清王朝的危機而言，根據本文所述，則在王朝腐敗，帝國主義侵略之外，還有一個更深遠的因素，那就是世界經濟蕭條。這次世界經濟蕭條只造成清王朝的危機而未導致清亡，並不能用來證明世界經濟蕭條與明清的朝代危機沒有關連。相反地，由十九世紀清王朝之因世界經濟蕭條而衰微，因世界經濟景氣而中興，正可以說明，在這段期間，世界經濟的起伏是可以深深影響中國王朝的興衰。

(65)林滿紅，《世界經濟與近代中國農業》，頁319—320。